

孫詒讓遺文輯存

(温州文史資料第五輯)

孫詒讓遺文輯評

(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张宪文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温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孙诒让遗文辑存

(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张宪文 辑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瑞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插页8 字数36.4万 印数：1—119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537-5/K·133 定 价：7.50元

序

王 季 惠

一九八八年十月下旬，瑞安各界人士为纪念孙仲容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集会庆祝。同学戴幼和教授校订孙先生文字学三书：《名原》、《古籀遗论》、《契文举例》，即将付印，自上海驰书相告，温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宪文君多年搜辑孙先生的遗文，亦适以是时编次成集。这是以学术成果纪念学术大师。乡邦文化，后起有人，私心为之喜慰。

回忆四十年前，浙江学术界在杭州集会纪念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我为文在《东南日报》的纪念专刊发表，概括先生一生立身处世的大纲为：“以一身兼具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顾亭林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怀抱，周公的‘以政教致太平’的理想。而承学之士，或不免仅仅以一代经师或学人看待先生，这是我们后学所不能不辨的。”这个结论，今天看来也还是确切的。值得补充的是下述三点：

一、向来学者以先生为清代朴学大师的殿军，不知他还是当时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的先驱。他的《闾礼政要》四十篇，引述了大量英、俄、法、德、美、日各国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的资料，包括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有效措施，企图引进资本主义各

国的文明，达到变法自强的目的，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然，在他引述东西洋各国文化措施来比附《周礼》经文、汉儒注疏时，不免有扞格难通之处。那是他尊经思想的表现，同时还有藉以“塞守旧者之口”的用意。我们是不能以此苛求前人的。

二、先生在革新教育、培养人才上的业绩于故乡影响深远，有口皆碑。甲午战争后，先生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及方言馆，培养现代科学人才。学术界流传“温州出科学家”是与此有关的。后被推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领导浙南教育事业，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三百多所。我少时进修的瑞安中学，后来任教的温州中学、处州中学，最初都是在先生倡议之下创办的。我所认识的故乡近现代学者，大都尊重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勇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直接或间接与先生的倡导有关。

三、先生以宏扬我国传统文化、倡导学校教育事业为一生职志，诗文餘事，非所措意。然当时沿海口岸中外文化的交流，开拓其胸怀；列强虎视，民族阽危的形势，加深其感慨；博览群书，淹通古今的学识，足供其驱遣；其诗文的成就，有非並时学者、诗人所能及者。先生《自题〈周礼政要〉后八绝句》之七云：“午贲姑榆战教宗，漫天飞旆苦连烽（按指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杀机金火终当尽，要看潜霆起蛰龙。”诗后自注云：“火器之盛，于今为极。揆之天时人事，必有废絀之日，其在电学发微，黄种将兴之际乎？”他的眼光一直注射到百年后的今天，並以乐观的态度寄希望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和平。这种胸襟怀抱，就远非当时一些侈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者所能及。

先生一生著述，据徐杭章炳麟先生综述：“其书已成者

二十六种，未成者七种，别有题跋书牋之属，不在著纂者，不可胜纪。”（见章氏《孙仲容先生年谱序》）建国前，我在故乡见到仲容先生的长公子孟晋先生，方致力于仲容先生年谱的纂述，並言将继续编辑先生的遗文遗诗，各为一集。惜孟晋先生后以双目失明，此事遂告中辍。张君宪文长期主管温州图书馆古籍部。温州图书馆原属纪念仲容先生的籀园图书馆。宪文景仰仲容先生的为学与为人，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先生的遗文遗诗，哀然成集，即将付印，来书嘱为一言。我和戴幼和少同里，长同学，在瑞安中学进修时曾寄寓孙家，获识先生之亲故，偶窥玉海楼之藏书，于先生一生的大纲大节，有所管窥。现在我和幼和各已年登耄耋，白发盈颠，仍思于乡邦学术文献有所补苴。虽日月逾迈，影响难追，而渊源有自，饮水不忘，故闻宪文此书之成而乐为之序引，以示来学。

1989年3月31日于中山大学之玉轮轩

序

蕭 家 祥

太姻丈蕭廣公歸道山后，介弟季芑公萃其遺文若干篇附《述林》付梓。越數年，鄉人楊宰剛（嘉）搜得遺詩二十六首，詞二闕。宰剛英華早謝，其父哭之慟，刊其雜著為《墨香移叢編》；公之詩詞，奕奕然在焉。宰剛契友陳繩夫（準）繼是而作，輯成《蕭廣遺文》二卷，文四十九篇，詩三十一首，詞二闕。其中《上田戴氏族譜序》以及永嘉叶莪士家藏《富貴殘碑銘》，則余所抄錄寄奉者也。

先師靜安先生嘗與余言，《述林》一書，應以經、史考證論學之作為主，其通俗酬應以及言事例略，應自為篇，以便後之學者。今事隔六十餘年，言猶在耳，中心懷之，胡或忘之。途來退食閑居，老病縈身，欲繼《名原》、《古籀餘論》之後，為《述林》校补缺文，厘革卷帙，方知同里張充文先生搜輯公之遺文成書，瑤瑄碎玉，巨細畢收，用力之勤，範圍之廣，承學之士，嘆觀止矣。

蕭公生當清室式微之日，敗衄蹙地，噩耗疊至，欲寄復仇雪耻之忱于生聚教訓之業，嘗謂：姬周之治，國有大學、小學，鄉遂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以致四海之大，无不造學之士，亦无不受職之民，賢秀者挾其才能，愚賤者貢其忱悃，君臣同德，上下齊

心，太平极盛之治，岂偶然而庶几者哉！即晚近东西诸国所以富国强兵者，亦莫不于广学设教，启迪民智之途求之。循公有鉴于此，仆仆风尘，历山陲，践海隅，惟筹资兴学之大业是谋，虽古之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者，奚尚焉？惜年甫中寿，溘然物故，志业未竟，遐迹哀之。我生也晚，不及亲即髻袂之侧，而其笃学懿行，传诵于师友间者，未尝不心醉神迷而向慕之也。

宪文之先德为循公故知，今宪文辑公之遗文成，非特明两家之高义亮节而已，盖将使世之深于循公之学者，必将洞悉明刑弼教为秉国之钧者，固不可一日或忽也。

己巳端阳，永嘉戴家祥幼和甫叙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时年八十有四

前 言

一

孙治让(1848—1908)，字仲颂，一作仲容，号籀廬，浙江瑞安人，是清季的朴学大师，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先生生长在官僚地主家庭。父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道光二十年进士，由翰林累官布政使、太仆寺卿。先生五岁即随父居住北京，亲承庭训。同治六年中举，光绪元年，在刑部当了四个多月的主事，即辞官出都，侍父从宦安徽、湖北、江宁。当时，曾国藩开官书局于江宁，张文虎、刘曾力、戴望、唐仁寿、刘恭冕、成蓉镜等，均在书局校刊群籍，先生与之切磋学问，多获教益，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清代乾嘉学派中，先生最服膺王念孙、引之父子及钱大昕，梁玉绳诸人。于是执守以经学为中心，以文字训诂为基础，旁及史学、子学、典章、金石、校勘、目录诸学，走着正规的朴学道路。三十岁以前，即著《白虎通校补》、《六经甄微》、《温州经籍志》等书。光绪五年，父衣言致仕，先生随父归里。在承父命屡试礼部不第之后，即绝意仕进，潜心治学，先后撰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名原》、《礼述》、《古籀拾遗》、《周礼政要》和《契文举例》等书。其中《周礼正义》是清代经学伟著，梁启超誉为“光芒万丈”(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

旧学之总成绩》)；《墨子间诂》则覃思十年，集诸家说，多所发明，俞樾称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俞樾《墨子间诂序》)。余杭章炳麟目无馀子，但对先生学术成就，极为钦佩，以为“奄通今古”(《孙仲容先生年谱序》)，
“三百年绝等双”(《章氏丛书·文录六·孙诒让传》)。

二

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后，日益暴露出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当时民族危机非常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一方面是爱国志士奋起抗拒，要求变法维新和反清革命。先生的一生，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

甲午之战，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朝野震动，这对先生政治思想的变化，影响至巨。当时，国弱民贫的现实，今文经学的兴起，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的传播，都猛烈地冲击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王朝，先生被卷进了时代的旋涡。他历数前尘，自谓“少耽雅诂，矻矻治经生之业，于世事无所解，中年以后，忝念时艰，始稍稍涉论治之书。”(《沈蕙崑富强刍议叙》)因而“深愧所学与时不相应”(《与馆森鸿书》)，便渐渐地跳出了经师考据的圈子，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以为“自强之道，莫先于兴学”。于是从光绪廿二年开始，便在乡创办学计馆、化学学堂、博物讲习所和蚕学馆等书院学堂多所；还企图成立兴儒会，“合各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间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路、开矿山、兴团练、结外交、整吏治，“以圉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继而在乡从事农务、开矿、航运、渔业等实业活

动，並屡辞经济特科的荐征与京师大学堂监督及礼学馆总撰的礼聘，专心致志于地方教育事业。晚年，在清廷废科举之后主持温、处学务处时，更以培人才开民智兴学自强为职志，兴办了各级学校三百多所，在教育事业上作出很大贡献。

从一个信守乾嘉考据之学的朴学宗师，转而跟上潮流，走出书斋，议变法，阐西学，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渝民智，革新政治，就先生个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转变。早在光绪十二年，先生即接触西学，开始阅览《格致汇编》等有关科学技术的中译西籍。甲午之后，为探索政治，更进而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订阅各类报刊凡数十种，並重订读书治学课程，规定上午阅览新书报刊，下午料理地方事务及友朋书札，晚间则从事整理旧稿和新著，以点完矿烛一支为度。为便于直接阅读西籍，还曾跟从瑞安中学堂西文讲习蔡华卿学习英语（见孙延钊《先征君谱公年谱》）。这种焚膏继晷，不知老之将至的力学精神，实为一代楷模。

其时，南海康有为倡今文经学，当《新学伪经考》问世，先生以古今文家法不同，即斥为大谬。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他转而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並谓“公车上书，海内志士列名者一千餘人，浙人无与者，窃以为吾乡之大辱（《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三年，他读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认为所论洞究中国贫弱腐败之本，是救时的要策，即致书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张再由公车“作痛哭流涕之呼吁”，并且说：“明春值礼部试期，海内公车云集，宜订集数千人上书沥陈危局，吁请早定变法之议。”次年，当他听到本科公车将有所陈论，又急着写信给汪，说自己不准备进京应试，此次上书，不论内容如何抗直，他都愿意具名，“虽获严诘，所不计也。”

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先生扼腕时艰，心情更为悲愤，哀叹“禹域大势至此，可为痛哭。”（《与章太炎书》）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活动基地，他与章炳麟等互相倾慕，思想认识就随着更进了一步。“仇耻之激励良深，愤懑之勃发弥盛，相与抚髀兴奋，力求振作”（《再致支提学书》），终于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同情革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事败就义，先生闻而叹息，作《浏阳二子（谭嗣同、唐才常）歌》以哀之（见《先征君籀公年谱》，诗佚）。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鉴湖女侠秋瑾被捕，先生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敫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戴嘉熊避难来温，先生深惧“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促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乃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奉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先生甘冒风险，护之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藩宝崇、温州知府锡纶等相抗衡，力为陈乃新申辩，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亡国于今三百年”，这是他早在光绪二十四年自题《顾亭林集校本》写给章炳麟的诗句，从那时起，他就从心底里发出了大胆而炽烈的呼喊！

三

清儒为文，贵在达意，尚朴质不求辞藻，善于诗文的人并不多见。先生的父亲是清季古文辞家，所著《逊学斋诗文钞》，士林交誉。先生幼承家学，为文散骈兼工，韵语亦夔夔独造，而且才思敏捷，援笔立就，只是由于潜心经子古文字之学，以为“命世传远无贵于此”，因而随作随弃，篋不留

稿。他逝世前曾将生平单篇学术论著，订为《籀廬述林》八卷，辞章之作，悉摒不录入。身后，其从弟治穉增以笈书记状等文，扩为十卷，刊于一九一六年，于是，其文辞才稍稍见重于世。瑞安宋慈抱评其辞章云：“许、郑谈经，不善文章，任、沈多才，未谙考据。先生则序跋之作，比辛楣（钱大昕）而尤精；骈俪之文，与巽轩（孔广森）相比美。解经诂史，每有专篇；考献征文，尤多名作。……盖比汪中《述学》，且远过之。”

自《述林》刊行后，先生之诗文经邑人及其后人续为辑存者，计有下列四种：

一、《籀廬诗词》 邑人杨嘉辑诗二十七首，词二阙。收入《墨香笈丛编》，印行于一九二二年。

二、《籀廬遗文》二卷 邑人陈準辑。上卷录寿序、叙、题跋、碑铭二十八篇；下卷录书札、祭文、杂著二十一篇，并校补杨嘉所辑各体诗三十一首，词二阙。一九二六年印行。

三、《经微室遗文》、《籀廬题跋》 从侄宣编次。计各体文三十篇，题跋十七篇。一九三二年刊于《青鹤杂志》。

三书所录，间多互见，且印数甚少，世罕知者。

四、《经微室遗集》八卷 孙氏哲嗣孟晋（延钊）先生一九三二年编定，未刊。共为文九十二篇，诗六十三首，词二阙，并叙其原委云：“延钊累岁家居，校理先著，……从弟宣、从侄师觉并笃学能文，每资襄助……。”（《青鹤杂志·瑞安孙延钊启事》）具见辑录成书，固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

此外，孟晋丈曾就玉海楼书藏录得先生手校诸书题识甚夥。其师友往来书札，为数甚巨，原藏玉海楼一小斋中，不

幸遭白蚁之厄，十九毁灭，其幸存者，也都由孟晋文录入《先征君箴公年谱》¹稿本。

四

孟晋先生曾任温州箴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撰、浙江文史馆馆员。一九二七年自北京解绶归里，穷年矻矻，从事整理先著，写成《温州经籍志》、《箴公述林》等校勘记多种。所编《经微室遗集》及《先征君箴公年谱》二书，以有待补充整理，迄未刊行，恒耿耿于怀。解放后，复将玉海楼书藏及其先人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悉数捐赠温州市图书馆。一九八三年秋，我最后一次得再见先生于杭州寓庐，他说自己掇集先人遗墨，虽多历年所，然意犹未尽，今双目失明，无能为役，愿得乡里后生，踵而为之，庶残笈剩墨，免于泯灭。不佞稟承面命，即以补辑先生之遗文为事。然孟晋先生不久即归道山，遂致请益无从，意恒惘惘。

我年来谬掌古籍，得遍览温馆馆藏，并从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省、市博物馆、瑞安玉海楼等处蒐检先生遗墨，兼及故家世守之文物，所得较之《经微室遗集》及《箴公年谱》所录，约增十之三四。同时，也考虑到先生一生，除学术专著外，遗文很少发表，世人但仰慕为一代经师，对其政治思想之变化，诗古文辞之成就，都不甚了了。于是，遂将《遗集》及《年谱》所录之文并同新收辑到的遗篇，编为《孙诒让遗文辑存》，以期为当代学者研究孙氏暨近代学术思想之一助。在整理编次过程中，承乡先生王季思、戴幼和教授多加奖掖，并于编例、内容诸方面曲赐教益，复荷顾先生廷龙赐墨为此书题名，垂注之情，均铭感无既。

今年适值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逝世八十周年，承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同志之约，谨将此书作为《温州文史资料》第五辑付之刊行，以为纪念，私心至为欣幸。犹忆儿时恒聆先人言我家与先生家累叶通好，光绪季，先祖以率众抗捐，犯温守怒，致身陷监禁，赖先生援手脱之于厄，先君常称公盛德不置。迨余初涉世事，于役杭州，复从游孟晋丈于西泠，启蒙讲艺，受赐良多。今丈捐馆舍亦五载矣，往事如烟，音容宛在。此书之辑，非惟景仰前修，亦不胜风雪师门之感。顾局处海隅，深惭孤陋，其谬误及遗漏之处，至期海内学人及读者曲赐补正是幸！

张宪文

一九八八年六月

辑编凡例

一、遗文除少数已于早年刊行外，其余多未发表。《櫟廬述林》一书，现正由戴家祥教授据家刻十卷本重编，其未收者多为后加不属学术论著之作，现均收入本书，使《述林》为学术论述之什，《遗文》为辞章总汇之编，分类两行，如同汪中之《述学内外篇》。

二、孙氏所为文辞，向不留稿，浸多放失，至今遗篇剩墨，收集为难，故凡有所见，悉加收录，以符网罗放失之义。其中部分寿序，有出于敷衍酬应者，然此等文字，涉及交游，且多乡里戚党之事，亦具史料价值，故除少数存目外，仍具载之。又，遗文涉及太平天国革命及回、捻、拳民暨金钱会起义者，每以“匪”、“贼”诬之，其于清室，亦间有谰辞。此时代使然，未可苛求，兹仍如文照录，不加标记，读者识之。

三、遗文分论议、书札、杂著、碑传铭赞、记序、叙跋、白话演说辞、诗词联语凡八类十卷。各以作年先后为序。其无考者，编次于末。至前人绍述孙氏生平事迹之文辞，则作为附录，缀于书末，並殿以拙编《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以供参考。

四、各篇均分段、标点。文内孙氏自注及孟晋先生之按语，均以小字附文编排，原文多有古字，均改今字，以便省览，其漫漶、衍脱、讹误之文，处置均如常例。

五、集内除诗词悉依《经微室遗集》稿本校录外，其余各篇均于文末以括号注明来源，或以按语说明出处；其有可资稽考者，则揭其时事原委。遗文所题人名率称字号，凡书札所致对象，可考者于按语中注其姓名、籍贯、仕履，以明其相互关系；其余可考者于文内以括号注出；其习见者，无关紧要者，或无可稽考者，则从略。